

●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间佛教信仰

刘 礼 堂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礼堂(1963-), 男, 湖北大悟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摘 要] 自六朝至唐代, 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多大山深谷, 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理想场所。佛教信仰不仅流布于通都大邑, 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 深深影响着当地的民俗生活。佛教信仰于本区兴盛的原因, 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二是人们笃信佛教, 祈佛消灾降福。此外, 还与本区俗信鬼神的传统似乎也有某种关系。随着佛教在本区的传布, 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与他们的传统信仰及民间祭祀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关键词] 唐代; 长江上中游; 佛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4-0457-05

民间生活中的佛教信仰与其它信仰一样, 奉祀的目的都是为了祈福禳祸。但在形式上, 佛教信仰与其它民间祠祀又有不同。佛教有自己的神职人员和固定活动场所, 有定期的祭祀活动, 与普通民间祠祀相比显得正规一些。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佛教信仰与本区民间生活的关联问题。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长江上中游地区, 范围大致为唐代的剑南道、山南东、西道及江南西道一部、淮南道西部, 约当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一部和陕南一部。

如所共知, 佛教传入中国后, 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佛教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佛教不断地同中国的思想文化——主要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相碰撞、相影响, 逐渐在隋唐时代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二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它所鼓吹的无边“法力”不断地深入、影响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佛事活动成为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对于佛教有着与士大夫完全不同的理解。民众的宗教生活主要贴近人们所面对的现实, 民众的宗教意识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关怀和愿望。

大致而言, 自六朝至唐代, 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多大山深谷, 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理想场所。佛教特别是其中的菩萨信仰不仅流布于通都大邑, 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

考古资料表明, 至迟在三国时期, 佛教信仰已在江南一带逐渐形成。这一时期长江中游的墓葬中出现了不少反映佛教信仰的遗物, 如武昌莲溪寺永安五年(262年)墓葬中出土了前额带有类似“白毫相”的陶俑, 以及刻画有佛像的鎏金铜带饰, 据称是古代长江流域最早的佛教造像^[1](第173页)。而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资料也有类似的迹象^①。长江上游蜀地一带佛教的流传, 似乎略早一些, 如近年来四川所发现的若干例东汉晚期的佛教造像: 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石刻佛像^[2](第35页), 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石刻佛像^[3](第89页), 什邡皂角乡白果村东汉砖石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的佛塔与菩提树, 据称这是我国

所见到的最早佛塔^[4](第14页),宜宾黄塔山东汉墓出土的一尊坐于青狮上的佛像^[4](第21页)。另外,1942年在彭山县发现的东汉崖墓中的摇钱树陶座上的一尊座佛^[5](第57页),1989年在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上的铜铸佛像^[6](第17页),以及乐山西湖塘出土的施无畏印陶俑^[7](第84页)等,以上材料陆续公布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我们重新审视佛教传入中国的线路和历史提供了新鲜的资料。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是由西北陆路传入中原,又由中原之洛阳一带向南和西南传播。但以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迄今未发现过东汉时期任何佛像与佛塔的痕迹,如果按佛教是先传入中原再从中原传入江南及巴蜀一带的话,无论在时间顺序上和佛像塑造上都是无法解释的。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即佛教传入中国不只是一条途径,而是多源的。长江流域特别是巴蜀的佛教应大致是与从西域入中原的时间相仿甚至更早,由早已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由缅甸入云南再到巴蜀的。对此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业已言及,我同意这一判断。同时,考古工作者近几年在沂南、连云港等地发现的东汉佛教造像,表明佛教也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5](第103页)。另一现象也值得注意,即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汉代传入中原的佛教几乎全在上层统治集团中活动,而巴蜀的早期佛教实物却都在民间留存。这种情况似乎表明中原地区的佛教是官方由官道迎来,而巴蜀是自南方丝绸之路的民间小道传来的,两者途径各别^[8](第245页)。且佛教传入巴蜀之后,遂不断向全境发展。尽管文献上并无记载,但1981年在四川忠县涂井崖墓中出土的摇钱树与陶俑中发现的佛像,以实物证明了在蜀汉时佛教已达到川东地区^[9](第27页)。我们还知道,《法苑珠林》卷26《敬法篇》载:“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为蜀三贤寺主。”^[10](第50页)本段记载有年代,但记述似不太准确。另据《高僧传》卷12《释僧生传》说:“释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称,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11](第105页)此段文字表述准确,却又未记时代,但与前条所述应为一入。两段记载互参,可知僧生和三贤寺应为目前所知巴蜀一带最早的僧人与佛寺。当然,未见记载的僧、寺可能更早一些。有资料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各地建造了不少佛像,有摩崖石窟,也有寺庙雕塑,我们至今还能见到若干珍贵的实物。如蒲江龙拖湾石刻造像群(共10龕)有西凉嘉兴元年(417年)的题名碑刻,10号龕有唐代之前的造像,最早的是刘宋元嘉二年(425年),最晚的是北周武帝保定二年至五年(562—565年),最著名的则是南朝时期的造像;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483年)的无量寿佛石刻像;1983年广元城关出土的北魏延昌三年(514年)释迦千佛石刻造像;广元千佛崖和后泽寺石窟群中的南北朝时期石刻造像;新都宝光寺收藏的梁大同六年(540年)千佛碑造像;新都宝光寺收藏的梁大同六年(540年)千佛碑造像^[12](第19页)。

不论佛教是否最先传入中原或本区,但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南北朝晚期及隋代宗教思想的南北融汇合流。汤用彤先生曾指出:“自晋以后,南北佛学风格,确有殊异,亦系在陈隋之际,始相综合,因而其后我国佛教努力乃达极度。隋唐佛教,因或可称为极盛时期也。”^[13](第38页)我们知道,佛教到唐代已基本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进程。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经历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无论是彼岸的佛还是天上的仙,都被移植到民间普通人的心性之中。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这种变化表明,世俗社会人们对自身的关怀更为注重,对彼岸和天国的向往与对个体生命和生活的保障是连在一起的。

唐代佛教的发展表现之一,是佛教寺院遍布全国各地。据载,唐鼎盛时期,全国佛寺4000余所,当时之州(府)328,县1573,平均每州16寺,每县3—4寺。学术界认为,唐代佛寺定数的出现,标志着佛教自传入华夏,几经反复,到隋唐时已基本纳入中华帝国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有序轨道,成为中华社会精神文化领域里普遍而稳定的存在^[14](第109页)。我同意这一判断。

以唐代长江中游地区为例,唐代长江中游主要是今湖北境内诸州佛寺累计有多少,由于缺乏直接的记载,李文澜先生曾予以估计和推测^[15](第348页),参据张弓先生《汉唐佛寺文化史》、《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钩稽出唐五代僧侣行止佛寺共759所,其中荆州3所,襄州1所,鄂州4所,共16所。此外《方志》汇

计显示唐代建寺 3 901 所，其中约当今湖北境内诸州累积佛寺数多达 144 所，今略加变动引录如下：

《方志》所见唐长江中游约当今湖北境内诸州佛寺数统计表

道 别	山南东道	淮南道	江南西道	黔中道
州 府	江陵府 70	蕲 州 35	鄂 州 43	施 州 1
	峡 州 3	安 州 10		
	归 州 2	黄 州 17		
	襄 州 36			
	隋 州 5			
	均 州 6			
	房 州 6			
	复 州 6			
	郢 州 4			
小计	138	62	43	1
总计	14 州(府) 244 寺			

上表所列，当然不尽准确，因为无论《高僧传》或者地志，必然会有遗漏；而将当时之道州辖境与今湖北境之对应进行处理也必有误差，因此，表内数据只能以备参考。不过，一般来说，方志所载的佛寺数必定含上述两《高僧传》所见高僧行止的佛寺，所以表内所取《方志》统计数似并无大的误差。据本表，唐代约当今湖北境 14 州佛寺 244 所，平均每州 17.4 所，按当境 61 县计，平均每县 9 所，州县佛寺平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数，说明唐代湖北佛寺分布比较密集^[15]（第 348 页）。

我们还看到，随着佛教在长江中游的的流传，佛教信仰日益影响着当地的民俗生活，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与成佛说给人们以巨大的心理冲击，强化了民间原有的鬼神观念。人们一方面将佛教的偶像当做神鬼来奉祀，另一方面又将民间诸神视同菩萨。

这样一种倾向，在长江上游的巴蜀一带也基本相同。据《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的材料统计，隋唐时期益州高僧共 28 人，其数目仅次于当时的两京长安与洛阳。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军入成都，李顺“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16]（第 178 页）。宋真宗天禧年间，全国共有僧尼 39.7 万人，四川即有 5.6 万，占全国总数的 12.5 %^[17]（第 51 页）。至今遍布巴蜀一带的石刻造像足以看出唐宋时期该区的佛教胜况。据调查，今四川省范围内，有石刻造像的县市为 49 个，龕窟在 10 个以上的分布点为 124 处，其中多数是唐宋时期的作品。其分布之广、造像之多、题材之富、技艺之精，在全国是少见的^[8]（第 262 页）。

在巴蜀一带，唐宋以来竟有如此多的石刻大佛，而且绝大多数属唐代的作品，实令人叹为观止。这里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民间信佛的程度是何等之深。

至于佛教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和影响，梁启超、陈寅恪先生等早有提及^②，此不多说。我们知道，早在南北朝时期，由于齐、梁、陈诸朝皇室的大力提倡，佛教在江东一带已有很大的发展。根据道宣的统计，西晋时北方两京仅有寺 180 所，僧尼 3 700 人。而地处江左的东晋则有寺 1 768 所，僧尼 24 000 人。刘宋时增至寺 1 913 所，僧尼 36 000 人^[18]（第 209 页）。这些寺院和僧人应主要集中在江东一带。

为什么唐代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上中游一带民间的佛教信仰如此之盛呢？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我们初步的理解主要有两点：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如武则天十分崇奉佛教，还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在她的倡导下，当时的统治集团几乎处在一个崇佛的气氛之中。巴蜀地区的佛教造像中以弥勒居多，或许与此有关。二是由于佛教的传播日益深入人心，人们笃信佛教，祈佛消灾降福，幻想弥勒和大慈大悲的菩萨来保佑自己的生活 and 生命安全。此外，我想这与本区俗信鬼神的传统似乎也有某种关系。

我们可以举一旁证。释道宣《续高僧传》卷 27《唐苏州常乐寺释法聪传》载:

贞观十九年,嘉兴县高王神降其祝曰:“为我请聪法师受菩萨戒。”依言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断。后若祈福,可请众僧在庙设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盐县鄞阳府君神,因常祭会,降祝曰:“为我请聪法师讲《涅槃经》”,道俗奉迎,幡花相接,遂往就讲。馀数纸在。又降祝曰:“蒙法师讲说,得禀法言神道。业障多有苦恼,自听法来,身鳞甲内细虫嗽苦已得轻升。愿道俗为我稽请法师更讲《大品》一遍。”乃不违之。

这里表明,佛教的宣传采取了将杂神淫祠收伏于佛门之下的形式,或者民间将佛教的传说和灵验纳入了杂神淫祠的序列。

杂神淫祠之所以在民间久盛不衰,是和江南的生存环境分不开的。复杂多变的气候,常来袭人的蛇兽疫病,使得代表他们的精巫神怪在人们的眼中显得额外狰狞有力。因此,佛教吸纳杂神的过程,就是同各种自然力量较量的过程^[19](第 58 页)。不管佛教是使用何种手段来收伏那些杂神淫祠的,后者由此而成为全国性宗教的一部分。其结果,一方面佛教大大贴近了民间,被收伏的地方诸神如众星拱月般地衬托着佛像与佛寺,如庐山遗爱寺四旁就有众多依附的诸神^[20](第 123 页),成了佛教与民众联系的又一纽带。

日本学者阿郎肇一先生根据《资治通鉴》卷 292 后周显德三年(956 年)杭州所存废寺推算,在唐以后,“在台州可有一千六百六十三寺,在宁波该是五百九十。在吴越方面的寺院数,保守的估计也在数千寺之多”^[21](第 249 页)。这中间大概也有不少被佛教收伏的地方杂神淫祀。而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使佛教更有威望和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一部分杂神淫祠也由此能得到官府容忍,从而保存下来,当然它们也不再突出地成为地方意识的象征。这恐怕是唐以后江南的所谓杂神淫祀不再需用大规模的政治手段加以铲除的原因所在。

注 释:

- ① 如南京一带有关墓葬出土的陶瓷谷仓罐上,也贴有佛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 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27 页。
- ② 如陈寅恪先生认为:“盖滨海之地早应有海上交通,受外来之影响。”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 页;又梁启超认为:“其(佛教)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见梁启超《中国佛教研究史》,《佛教之初输入》,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14 页。

[参 考 文 献]

- [1] 湖北省博物馆. 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J]. 考古, 1965, (4).
- [2] 杨枝高. 四川崖墓考略[J]. 华文月刊, 1940, (6).
- [3] 唐长寿. 乐山磨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J]. 东南文化, 1989, (2).
- [4] 谢志诚. 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J]. 四川文物, 1987, (4).
- [5] 曾昭燏, 等. 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J]. 南京博物院院刊, 1943, (1).
- [6] 何志国. 试谈绵阳出土东汉佛像及相关问题[J]. 四川文物, 1991, (5).
- [7] 吴 焯. 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J]. 文物, 1992, (11).
- [8] 四川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 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J]. 文物, 1985, (7).
- [9] 释道世. 法苑珠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10] 释慧皎. 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1] 赵殿增. 四川十年考古收获[J]. 四川文物, 1989, (1).
- [12]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3] 张 弓. 汉唐佛寺文化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4] 李文澜. 湖北通史·隋唐卷[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5] 陆 游. 老学庵笔记[A]. 陆放翁全集[M]. 台北: 世界书局, 1963.

- [16] 徐 松. 宋会要辑稿·道释一[Z]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17] 袁庭栋. 巴蜀文化志[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18] 释道宣. 释迦方志: 教相篇第八[M] .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5.
- [19] 严耀中. 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A] . 唐研究: 第 2 卷[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20] 白居易. 白居易集: 卷 40[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1] [日] 阿部肇一. 中国禅宗史[M] .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8.

(责任编辑 桂 莉)

Folk Buddhism Belief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ang Dynasty

LIU Li-t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Li-tang(1963-),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gions for the spreading of Buddhism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This region has many great mountains and deep valleys, which made it an ideal occasion—for monks both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for thoroughly studying and advertising Folk Buddhism. Folk Buddhism Belief spread widely not only to the bigger towns and cities, but also deep into the remote and backward places. It deeply affected the tradition and lives there. The reasons for the flourish of Folk Buddhism Belief owed firstly to the positive advocating of the gerentocratic class, secondly to the deep belief of people who praying for blessing and averting disasters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I think that this phenomenon seemed to have some connection with the tradition of belief in ghost and gods in the region. With the spreading of Buddhism in this area, the local people's belief in Buddhism was somewhat combined with their traditional belief and folk sacrificial offering.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uddhism Belief